

中国新文学与日本文学掠影

赵 冬梅 宋 志明

A Brief Observati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Zhao Dongmei Song Zhiming

Abstract

During the long history of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hina has almost always played the role of teacher. But the situation chang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student became the teacher at that time. Many Chinese went to Japan to study. As a result, Japanese literature influenc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ery much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contribution from Japanese literature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a) As a kind of medium.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began to study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hrough Japan. They read and translated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through Japanese editions. b) As a kind of enlighte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as directly inspired and stimulated by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developed into a significant revolutionary trendsetting literacy movement.

中日文化交流互为“先生与学生”的微妙关系，这就是隋唐时代日本学习中国，比如当时日本派遣留学生和僧人如阿倍仲麻吕、或访华使团如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鉴真东渡日本传经等以及明治维新中存在着新以后中国向日本学习。

1896年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到1903年出现留日热，以后几乎逐年增加。留日学生虽然千差万别，但遭遇却几乎一致：“读西洋书，受东洋气”，因而许多人从爱国走向了革命，如孙中山、蔡锷、秋瑾、黄兴、宋教仁等，而且留日学生所办报刊杂志之多、组织的团体之多，在中外留学生史上都是罕见的，如梁启超等主办的《新民丛报》，李叔同、欧阳予倩等创建的春柳社等。

留日学生通过日文重译或翻译了大量的西洋学说、世界名作，其中最早而且意义重大的是鲁迅、周作人于1909年合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收作品37篇，另如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虽根源于俄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其中的主要论点则多半是通过日文或英文的翻译而接触俄国书报的。创造社高张的“为艺术的艺术”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多是从日本移植的，至于2、30年代的普罗文艺思潮就几乎全是从日本转贩而来的，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日本学习欧美、翻译文学兴盛有关。另外，通过日本教育，留日学生一般都能掌握两种以上的外国语，打开了直接通向欧美文学的大门。郭沫若在描述“五四”新文学时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留日学生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骨干，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从而使日本成为我国通向世界文学的一座桥梁！有学者把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作用及其方式归纳如下：其一为媒介作用，即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欧美文学，或通过日文译本阅读欧美文学；其二为引发与启示作用，即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大都是在日本文坛的直接引发、刺激和催促下形成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也和日本文学的发展进程有着高度的相似形。本文选择几个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比较大的流派、文学现象，加以介绍和比较。

和歌、俳句是日本的一种独特的诗歌形式，被认为是世界是最短的格律诗，主要表现刹那间的感情、捕捉瞬息间的思想火花，这种形式是日本人吸收汉诗的联句而加以成功创造的。著名的俳句大师有松尾芭蕉（他的名作是

《古潭》：“古老的水潭呀，青蛙跳水的声音”或“古潭蛙闯入，止水起清音！”，田汉曾由此得灵感写成了话剧《古潭的声音》）、千家元浚、柄井川柳（“孩子出世，三人睡觉成川字”，他对周作人有极大的影响，周作人称他的作品为“风俗诗”）等，和歌、俳句对“五四”时期盛行的小诗有着仅次于泰戈尔的影响，当时著名的小诗作者有郭沫若、俞平伯、冰心、宗白华、钟敬文和湖畔社等。

私小说，也译为“自我小说”或“心境小说”，被看作是日本自然主义流派的一种小说文体，是自然主义在社会领域转向狭窄的私生活的产物，产生于明治末年，盛行于大正时期。1904年，田山花袋在《露骨的描写》中提倡为了原本再现现实生活必须“写得露骨又露骨，大胆又大胆，几乎使读者禁不住战栗起来”，1907年他模仿德国作家哈特·霍夫特曼的《寂寞的人们》发表了《棉被》，主要描写情欲的苦闷，为记载身边琐事、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自然主义的写作态度的私小说开辟了道路。其他有代表性的私小说还有武者小路实笃的《天真的人》，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芥川龙之介的《当时的我》，菊池宽的《朋友之间》等，我国翻译最早、影响最大的私小说是林纾、魏易合译的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创造社的几位小说家都受到私小说的影响，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的死》、《还乡记》等带有“自叙传”的性质、充满性的苦闷和死的诱惑的作品，几乎近似日本的私小说；郭沫若早期的文学主张“要本着内心的冲动以从事创作”，和私小说的理论有吻合之处，他《漂流三部曲》、《阳春别》、《湖心亭》等都有着私小说的痕迹；张资平被称为“中国的菊池宽”，他的多角恋爱小说曾风行一时，但他更多地是从消极的方面接受了私小说的有害影响，遭到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批判。

五四时期，新文学者们对日本文学理论的借鉴，在数量和影响方面要大于文学创作。日本在移植欧美的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创造和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如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曾被许多高中师范学校用作课本《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等，其中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影

响最大的是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他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塔之后》自1925年由鲁迅先后翻译成中文，并对他做了高度的评价后，他的著作很快在中国流行起来，主要著作几乎全都被译成中文，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胡风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日本主要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的著作，几乎都有中文译本。新文学的先驱们从他们那里借鉴了研究文艺科学的方法以及独创精神，来发展中国向来不发达的文艺理论，来指导创作实践。

白桦派因杂志《白桦》而得名，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1910年至1923年是白桦派及其刊物的存在和活动时期，代表人物有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它的思想特质和文学主张深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有欧洲张扬个性的人道主义，也融会了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爱和平的人道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白桦派在日本几乎和人道主义成了同义语，表现为尊重个性、发展自我、对弱小者充满同情，与此相关，白桦派谴责暴力、反对战争、向往和平，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鲁迅于1922年翻译）反战意识十分强烈。1918年一次大战进入尾声，日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米骚动”事件（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推动了日本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武者面对日益尖锐化的社会矛盾，便想通过非暴力手段创建新村，即移居乡间，与茅屋、山水、田园为伴，建立一个人人自由、资产共有、没有暴力、能充分展示个性的合理社会，新村运动是白桦派人道主义思想运动的一种象征。同年7月，《新村》杂志问世，11月，新村在九州宫崎县诞生，武者宣称：“新村的理想是，全世界的人要完成其天命，每个人要发展内心的自我”，“人断不可失爱、正义、勇气三件”，他曾著《人的生活一书》作专门论述。新村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即理想主义的“新村丛书”，武者小路在新村生活前后8年，他的许多小说和剧本都诞生在这个时期，《幸福者》、《耶稣》、《第三隐者的命运》被成为他的“新村三部曲”。

1919年7月，周作人作为第一个造访新村的外国人访问了新村，并写了《日本的新村》、《访日本新村记》（这两篇文章曾收入中学教科书）等一系列

文章，介绍并表达了对新村运动的赞赏，并与武者小路有共鸣之感，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文学缘分，他不仅给予白桦派以极高评价，并承认深受其影响，有研究者指出，他那篇影响巨大的《人的文学》便是武者小路等人的文学理论的发挥，如对人道主义的提倡、爱人类、有个性等。五四时期，王光祈等人在北京也进行过新村试验，另外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提倡俭学、思想文化界鼓吹的劳工神圣、教育家陶行知的“晓庄实验”等，与新村运动的精神都有相通的地方，并且与俄国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也是一脉相通的，受其影响，田汉还拍摄了《到民间去》的片子。此外，鲁迅、郭沫若、张定璜等都曾介绍过白桦派的作家作品，并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鲁迅吸取了有岛武郎的“对一切幼者的爱”的精神，张和郭则通过有岛武郎（他著《叛逆者》介绍罗丹、米勒、惠特曼，他的作品中到处可以发现惠特曼的诗句）而开始接触惠特曼的《草叶集》，惠特曼豪放而自由的诗强烈地激起了郭作诗的热情，诗风也由泰戈尔转向惠特曼。1923年6月，有岛武郎自杀，8月《白桦》停刊，而周氏兄弟失和而开始分道扬镳；1937年七七事变后，武者小路堕落成为军国主义张目的文人，鼓吹“大东亚圣战”，赞颂战犯东条英机，而周作人则附逆投敌，两人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

白桦派衰落后，继之而起的有新感觉派，这是日本最早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之一。日本在20年代初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后遭到残酷镇压，左翼作家处于白色恐怖的危险中，日本文坛便尝试着用一种新的形式开辟文学创作；同时，欧洲文坛的现代派在一战后逐渐传入日本，这样，在内外因的影响下，横光利一发表了《新感觉论》、川端康成发表了《新感觉辩》和《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片冈铁兵发表了《新感觉派的主张》，来阐述他们的艺术追求和文学主张，评论家千叶龟雄认为他们在否定旧的文学传统的同时，追求一种新的感觉、新的生活方式和对事物的新的感受方法，因而称他们“新感觉派”。1924年《文艺时代》问世，川端在《创刊辞》中提出了将用文艺取代宗教和革新文艺、革新人生中的文艺和艺术观念的主张，横光利一则发表了小说《头与腹》，标志着新感觉派作为

一个自觉的文学流派正式诞生了。

欧洲现代派艺术为新感觉派的诞生孕育了土壤，川端曾宣称：“表现主义的认识论，达达主义的思想表达方法，就是新感觉派表现的理论根据”，又说：“也可以把表现主义称做我们之父，把达达派称做我们之母”。这样，他们从认识论上否认现实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认为主观是唯一的真实，文学艺术就是要表现主观、表现自我，物质世界只有感觉到它时，它才存在，因此它是感觉的产物，作家的任务就是去感受它。在此基础上，他们把感性和理性也截然分割开来，强调以主观感情去“感觉生活”、“让主观自由翱翔”，强调瞬间的感受，所谓“精神爆发”的一刻，重主观、直感、形式而否定客观、理性和内容。在创作方法上，他们把西方现代派的技巧融和起来，如横光利一所宣称的：“未来派、立体派、达达派、象征派、结构派，以及如实派一部分，都是属于新感觉派的东西”。代表作有：横光利一的《上海》、《太阳》、《苍蝇》、《春天马车曲》、《拿破仑与疥癣》，川端的《感情装饰》、《梅花的雄蕊》、《浅草的红团》，片冈铁兵的《钢丝上的少女》、《幽灵船》等，这些作品是他们理论的具体实践，都是从主观感受出发，用暗示、象征的手法，通过光线、声音、速度和刹那间的感觉，引起强烈的官能刺激，来表达作者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虽然也揭示了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但带给人们的是虚妄、病态和危机感。1927年《文艺时代》停刊后，新感觉派便逐渐解体了。

中国的新感觉派（这是左翼文人楼适夷在1931年提出的，施蛰存从来不承认自己属于新感觉派，声称自己“不过是应用了一些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小说而已”。）是在日本新感觉派的直接影响、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浸润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1928年刘纳鸥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共出8期，1928年底查封停刊），刘纳鸥、戴望舒、施蛰存等在刊物上进行现代主义、新感觉主义的尝试，还出版过法国作家保尔·穆杭的专号（他是给过日本新感觉派很大影响的一个作家）。1929年9月，施蛰存、徐霞村、刘纳鸥、戴望舒又共同创办《新文艺》月刊，发表的作品新感觉主义的倾向更加明显。

刘纳鸥（1900—1939）出生在日本，又接受过日本的教育，他唯一的小

说集是《都市风景线》，用现代情绪去感受东方大都会上海的光怪陆离，小说文体充满了意识的跳跃、流动，洋味十足，令人耳目一新，有文章称“意识地描写都市现代性的作家，在中国似乎最初是《都市风景线》的作者呐鸥”。他还翻译过横光利一等人合著的《现代日本小说选集》，出版时以片冈铁兵的一篇《色情文化》做书名，给新感觉派以很高的评价。1930年夏，《新文艺》又被查封，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创刊，穆时英（1912—1940）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公墓》后，又接连发表了《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一系列具有明显新感觉主义特点的小说，成为风行一时的海派作家，并出现了众多模仿“穆时英笔调”、“穆时英作风”的文字，被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充足的才气使他创造了心理型的小说流行用语和特殊的修辞，运用通感（“她的眸子里还遗留着乳香”）、有色彩的象征（“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啊！”）、动态的结构、时空的交错以及充满速度、节奏的表达方式，塑造了一个立体的、繁华的由金钱和性所构成的享乐、消费、摩登的大上海，有人认为他比刘更进了一步。两人都是富家子弟和洋气十足的文科大学生，刘办水沫书店时曾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还翻译过《艺术社会学》，俨然是个进步作家；穆早期出版《南北极》时，曾被认为是“普罗小说中的白眉”，但两人又不约而同地走到了新感觉派的旗下，最后又都在汪伪政权中办报而被暗杀。

在新感觉派中，施蛰存（1905—）的创作比较独特，他有意地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创作心理小说，其中有历史题材的《将军底头》、《石秀》、《李师师》等，用精神分析来重新解释历史人物和事件，也有表现现代都市男女生活的《梅雨之夕》、《春阳》等，他的小说不断尝试新技巧，还写了表现潜意识的《夜叉》、《魔道》和类似心理探秘的《凶宅》等。与前两位不同的是，他身上还有着城乡二元倾向，除去那些有模仿痕迹的作品，他成熟的代表作中都有着城乡之间的文化碰撞的结构，因而在他的现代派特征中还有着中国的民族特色。他在评价自己对中国小说的贡献时说“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

新感觉派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同时也都市文学中重要的有特色的一支，他们以或迷恋或批判的态度描写出了现代都市的种种风貌，使现代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丰富了中国的都市文学及现代小说，同时，他们对心理分析、意识流、通感等技巧的运用，对创作主题的主观感觉、印象的强调，也丰富了现代小说的创作。

主要参考文献：

- 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
孟庆枢主编：《日本近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时代文学出版社，1992年
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温儒敏：《鲁迅前期的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
[日] 伊藤虎丸：《创造社与日本文学》，载《中外文学研究参考》，1985年第4期
吴福辉：《中国新感觉派的沉浮与日本文学》，载《日本文学》，1986年第2期
[日] 竹内实：《鲁迅的日本文化、文学观》，载《鲁迅研究》第12辑
赵京华：《周作人与日本文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张福贵：《周作人早期人生哲学与日本白桦派》，载《中国比较文学》，1992年第2期
[日] 伊藤虎丸：《郁达夫与佐藤春夫》，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赵冬梅，女，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赵冬梅负责撰写了本文的大部分，最后的新“感觉派”部分由宋志明撰写）